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政治学研究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4

3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主办



手机扫描王

政治学研究 (双月刊) 二〇二四年第三期 (总第一百七十六期)

主编:张树华

目 录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进路研究 李 毅(3)

学术前沿

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韩庆祥 汪业周(13)

身份: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机制 周 平(23)

美西方语境语义中的“民粹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分析
..... 汪亭友 吴深林(36)

超越数字政府建设中的伦理冲突叙事:以权力间博弈演化为视角
..... 魏 巍(50)

作风建设、政党纪律与党的自我革命
——基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情况的理论思考 王 锐 倪 星(64)

国家治理

“精准定责”:数字治理语境下纵向政府间关系的新可能 黄 颀(76)

统筹的逻辑:干部激励与约束平衡研究 夏美武(94)



双向清晰化的过程及其融合治理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信息分析 韩志明(111)

政党如何协调区域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治模式”初探 柳建文(125)

政策试验网络何以有效运转?

——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为例 易承志 彭 洋(140)

基层治理

城市基层治理的产权逻辑

——基于“产权类型—分配过程”的分析 吴晓林(155)

数字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的政策创新与系统变革 王阳亮(168)

基层公务员工作动力研究 胡晓东(181)

国家安全

公共外交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机理、挑战与路径选择

..... 肖 晞 杨依众(200)

国家安全视域下大党独有安全难题:识别、确证与解决

..... 曹海军 杨世照(214)

学科建设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以 1919—1949 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例

..... 吴汉全 王中平(227)

英文目录、内容提要、关键词(Contents, Abstracts and Keywords) (240)



政治学研究

2024年第3期 总第176期(双月刊)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4年6月18日出版

主管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主 编 张树华
编辑单位 《政治学研究》编辑部
通信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100732
电 话 (010) 85195812
投稿邮箱 zzyj@cass.org.cn
网 址 zzyj.ajcass.com

出版单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13-16层, 100029
印 刷 唐山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82-838
电 话 (010) 59366555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Q5496

ISSN 1000-3355
CN 11-1396/D



社科期刊网

ISSN 1000-3355



9 771000 335249

06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 010-63098272

PDF 个: 68.00 元

手机扫描王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以 1919—1949 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例

吴汉全 王中平

内容提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话语体系”的学术理论,又需要有中国现代政治史等关联学科研究的基础,同时还需要有中国现代政治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学科的研究中,最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这个主体性内容,这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演进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研究 1919—1949 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不仅对构建整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体系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而且对于当今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亦有很大的学术启示。由此,需要基于学术创新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问题给予切实的理解,坚持以“政治史为基础”来分析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创建的条件,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视域中重点梳理这一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产生、发展、初步成熟的轨迹,阐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学术研究价值与社会意义,从而真正构建起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的研究体系,借以为当今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本土化学术资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新民主主义政治学 民主革命时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变迁相结合的政治学成果,自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突出标志,因而也是我们现在研究政治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所应高度重视的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构建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同样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这门学科。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界尚未有一部系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著作^①,这不利于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既有的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专项中国历史研究院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通史研究”(23VLS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研究”(22BDJ009)的研究成果。本文的主要观点,在 2023 年 11 月 4 日于深圳召开的中国政治学会 2023 年学术年会暨“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过。

① 笔者于 2008 年 11 月 23 日在苏州参加了“教育部政治学科教指会议暨高等学校政治学学科第 23 届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在讨论“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培养计划时,曾提出开设“政治学史”这门课程的建议,认为有必要使学生知道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主张在条件许可时开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的选修课。

学术成果基础上开拓前进。本文以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即“新民主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情形为例,就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体系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能为当今政治学研究及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某些启示。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仅是学术上嵌入中国经验、赋予中国特色的问题,而且是理论上从一般到具体的问题,亦即如何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映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学成果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首先要明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个基本概念,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视域中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演进轨迹,进而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演进规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治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有着各种解释,代表性的观点有:

《简明政治学词典》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解释是:“亦称‘无产阶级政治学’。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政治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治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基础上,总结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新经验的条件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并由列宁在新时期发展的,毛泽东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当代作出了重大贡献。”^①

王惠岩主编的《政治学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但给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对政治学这门科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出现,是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的开山之作就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第一个政治纲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第一个纲要。”^②

王浦劬等著的《政治学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叙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是当时社会矛盾运动和政治斗争发展的理论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吸收前人政治学说,尤其是法国启蒙政治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政治学说中的合理成分而形成的思想革命成就。”^③

上述各家的看法尽管比较简要,叙述的逻辑也不尽相同,但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条件),尤其是突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政治学的指导地位。这是我们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范畴时,必须加以遵循的。

然而,中国政治学界亦有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就是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就“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思想,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问题,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目的和重点所在,主要是要解决政治实践问题,其“关键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正是政

① 编写组:《简明政治学词典》,第5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王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第2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第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的就是政治学的问题”^①。笔者的看法是,政治学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论,实际上是将人类历史的政治现象,简单地归结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种政治现象。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对应绝对化、简单化,只能是指一种大致的情形。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之上的,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也有一些政治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本身,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阐明了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因是阶级斗争的这一政治学的重要问题,并且在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体系中阐明政治现象的上层建筑性质、特点及其基本功能。就此而言,仅仅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看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远远不够的。政治学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论,其结果就是将政治现象限定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范围中,缩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范围及其所具有的历史视域,直至丢失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于历史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的政治的一些极为重要的观点。

笔者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研究整个人类历史上政治现象的学术体系,研究对象乃是涉及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来一切的政治现象,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包括但不限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论述政治现象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不是简单地从社会中的政治现象本身来立论,而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从人们的社会关系、从社会经济利益来研究的,认为政治现象乃是随着阶级产生与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现象,并处于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之中;政治现象在社会结构上,是属于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受制于社会的整个的经济基础,其本身不仅构成系统,而且对上层建筑中的其他因素亦起制约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必然有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关系,因而政治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至于“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乃是“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②。现代社会“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所谓“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就是说,“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③。至于“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④,而在国家体系中的“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⑤由此,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就应该遵循唯物史观关于政治现象的科学论述,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体系来解释和说明,并且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来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还是以先进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并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

① 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5—306页,第30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美学等诸多学科视域中形成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视域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内容是包括阶级社会以来的国家、阶级、政党、社会革命、人民等一切政治现象的各个方面,并且在政治现象层面涉及政治性质、政治意识、政治体系、政治行为、政治发展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乃是考察阶级社会以来全部政治现象的,不仅表征了人类政治现象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了关于政治现象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因而是一个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的完善的科学体系。

回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学术历程,不难看出经典作家确实是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研究重点而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但马克思、恩格斯亦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研究和阐发整个阶级社会之中政治现象的相关问题的,并且批判和汲取了前人的政治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中,马克思、恩格斯较早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主要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纲领性文献。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又写下了一系列政治学著作,主要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等。此外,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管理、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著作,需要基于唯物史观而作深入的研究,并将政治现象置于社会现象之中来进行文本的解读,构建出符合经典作家原意的政治学体系。

基于唯物史观对于政治学的指导地位并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研究的突出意义有二:其一,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演变和发展,阐明民主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政治学”的演变历程,固然要注意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个学术上的源头及其中国化的历史,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此。而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理论、观点,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在聚焦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学这个研究对象时,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尤其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一政治现象演进的实际,坚持“以政治史为基础深化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思路,特别是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变革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及建设新社会的诸多努力在其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及对于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的重大贡献。简言之,就是要基于唯物史观视域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来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进程,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这一主题。

二、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形成问题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并构建其学术体系,首先要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的时间上限。在笔者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建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以191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主要标志。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在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建提供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第二,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和条件,这主要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期间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国共产党也在随后的1921年成立并担负起领导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这就需要有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中国政治变革的理论;第三,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代中国已经具有一定的学科积累,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理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在清末民初业已传播到中国,可以为创建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提供学术上的借鉴资源。

在确立1919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起点的前提下,需要说清楚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简单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践的学理需要,基于唯物史观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分析中国的政治现象、研究中国的政治实践,同时又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斗争中而逐步创建起来的;而毛泽东政治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①。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恽代英、邓初民、陈启修、高尔松^②等)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重大的贡献,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成功地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的新道路,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如何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重大理论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其所创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主要标志^③。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形成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问题,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结合问题,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的问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这个核心内容,在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形成问题时,需要注意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学术成果,并且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政治思想为指导的,自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为前提。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以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才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开来,并与中国的实际政治斗争逐步结合起来^④。在《我的马克思

① 鉴于毛泽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上的特殊地位,笔者指导研究生撰写了《毛泽东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构建》毕业论文,提出毛泽东的政治学体系是包括“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和社会主义政治学体系”的观点。参见李娜:《毛泽东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构建》,徐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② 高尔松(1900—1986),字继郇,高希圣是其笔名,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练塘镇人。以高希圣笔名出版的政治学著作很多,代表性的有《新政治学大纲》(平凡书局1930年版)、《政治思想史》(世界书局1930年版)、《国际运动发达史》(上海光华书店1930年版)、《社会运动全史》(平凡书局1930年版)、《政治法律大辞典》(科学出版社1934年版)、《国际与中国》(与郭真合著,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社会运动家与社会思想家》(与郭真合著,平凡书局1929年版)等。高尔松不为今天的中国政治学界所熟识,他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其最早研究政治学的领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于1926年就出版了《国际社会运动小史》(上海光华书店1926年版,光华书店1927年4月再版),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第一、第二、第三国际等的情况。其后,高尔松在1930年又出版了《国际运动发达史》(上海光华书店1930年2月版),以8章的篇幅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发展,并介绍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成立的背景、经过、会议、活动及其历史意义,同时亦介绍了国际反帝同盟的产生、活动、组织的情况。

③ 吴汉全、王娟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的基本结构》,《湘潭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④ 关于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上的先驱者地位,参见拙著《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第五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开创者”部分,第338—3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主义观》中,李大钊翻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批判〉序言》中的部分内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科学地说明了“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受制于生产力这一“最高动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定“政治”含义提供了认识基础。李大钊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政治,即使是社会问题也都与政治有关。他的看法是:“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①李大钊把社会变革的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认为中国政治的前途就在于“与大多数人民一道,为推翻欺压人民的军阀和机会主义的政客,把政权夺回到人民手中,除此别无他途”^②。陈独秀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先驱,在1921年就认识到革命与社会制度变革的关系,指出:“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的一种手段,倘革命后而没有新的制度出现,那只是捣乱、争权利、土匪内乱,不配冒用革命这个神圣的名称。”^③随着陈独秀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他认为“革命”是社会组织进化的战争,在“每个进化阶段新旧顿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革命既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的现象,则革命必以不违反进化社会组织为条件”,故而“革命”乃是“推进人类社会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④。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及其以后有一个明晰可见的传播过程。自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不是与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截然分开的,实际情形是两者紧密结合、互动共进、相得益彰。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传播的初期,也就实际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譬如,李大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先驱,但他也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他提出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但同时亦要研究“主义”如何能够“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⑤,因而不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停留在宣传阶段。又譬如,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他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传播。他在延安时期,指示有关部门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并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研读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要求。这说明,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传播过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构建体系的过程截然分开,要看到构建体系之中包含着传播并以传播为前提。当然,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始终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实践为基础,不仅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而且要有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队伍,同时还要有杰出的政治家、政治学家所构成的群体,等等。

二是关于思想战线的政治论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作用问题。学术的创新始终离不开论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建始终与思想战线的政治论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争,又有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而前者往往不引起人们注意。其实,这两种情形的思想上的政治论争,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都是有益的。譬如,20世纪30年代,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与独裁”的思想论争,批判了蒋介石对共产主义的诬蔑,揭露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本质,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共和国理论的形成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又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虽然不全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论争,但这些论战显然都关涉中国政治出路的问题,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分析

①②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39页,第447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③④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88页,第402—4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1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的基本观点,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的研究,提出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论断,并在论争中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这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构建有着突出的意义。再譬如,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反对教条主义,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①不难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建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与各种错误思想斗争而取得胜利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是与政治论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总之,思想上的政治论争增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实际政治状况的了解,激发了理论创新的热情和智慧,因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建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三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的的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实践并经受实践的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形成,固然得益于政治学的学科积累、思想界重大思想论争等方面的有力推动,同时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实践为基础的。譬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从“社会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话语转换,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成果及其需要而得以实现的。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将“社会革命”解读为在中国开展“民主革命”,申明中国的“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②。随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提出了“国民革命”的概念,认为“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及“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这种“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③。其后,邓中夏更进一步申明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民族革命”,并阐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所应担负起的领导使命,这就是“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不是附属什么资产阶级而参加,乃是以自己阶级的目的而参加;所以我们在国民革命中应以自己阶级利益为前提的。”^④瞿秋白则以“最现实的”及“唯一道路”等话语来评价“国民革命”,一方面阐明“无产阶级的斗争”在其中的主导性地位,借以说明其对于中国“社会改造”的重大价值,另一方面又从世界改造的角度来提升其意义,指出:“这种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⑤不难看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话语之中,“国民革命”乃是符合中国现状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

③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57页。

④ 邓中夏:《邓中夏文集》,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 瞿秋白:《中国国民党与戴季陶主义》(1925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4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①上述关于“社会革命”到“国民革命”话语转换的例证,可以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服务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三、关于 1919—1949 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演变历程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既然是“史”的性质,则要研究其沿革,亦即要阐明其学术演进的历程。1919—1949 年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实际上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学史”,因而以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基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主要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内容是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要义的国家论、阶级论、政党论、人民论等部分,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践相结合中形成的学术体系。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包括指导理论、研究理念、研究内容、研究目标、话语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亦做出重要贡献。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最终形成学术体系,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的,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的集大成者。故而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学史的分期上,可以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轨迹作为参照。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可以将 1919—1949 年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演变历程,分为三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初创阶段(1919—1927)。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得到传播,其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转入政治大革命的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体系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得到初步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在 1919 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后产生的,其标志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谭平山、恽代英、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在政治上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对研究现实政治问题颇有兴趣,且具有中外学术文化的深厚功底,他们或身在大学讲坛精心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或创办刊物向思想界、学术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或亲自投身革命斗争的实践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袖群体。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初步地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宣传“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及基本方略,并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国家、阶级、革命、政党等政治学的相关内容进行讨论,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因而 1919—1927 年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初创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阶段(1927—1937)。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的斗争中,发展了中共四大前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其主要标志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独立的政治实践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初步形成体系。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了大量的学术专著。代表性的有:邓初民的《国

① 周恩来:《再论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赤光》,第 9 期,1924 年 6 月。

② 这里涉及政治学史的分期问题,需要有一个分期的标准。笔者以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及其学术成果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史的分期标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研究的学术成果乃是重要的标识,因而可以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于中国政治分析的过程、程度及其成果作为考量的标准。自然,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分期标准及其所划定的几个时段,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家论之基础知识》(1929年)、《政治科学大纲》(1929年)及《政治学》(1932年),陈启修的《新政治学》(1929年),秦明的《政治学概论》(1929年),高振青的《新政治学大纲》(1931年),傅宇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1932年),来逸民的《政党组织之理想与实际》(1935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等,在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体系方面有重大的贡献。此外,李达的《民族问题》(1929年)及《社会学大纲》(1937年)等著作,对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国家的命运,对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作了大量的论述。这期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及唯物辩证法论战,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认识中国的国情、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初步形成了有关国家、阶级、政党、革命、人民等问题的政治学体系。因而,1927—1937年间也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初步成熟阶段(1937—1949)。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延安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中心。1938年5月成立了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张闻天兼任院长,下设历史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教育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等,集结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等问题。这里,“中国政治”的研究乃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共中央还于1941年8月作出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加强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调查和研究。1942年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在推进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达到初步成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有独特的贡献,他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相结合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中的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人民论、政党论等都有重大的发展^①,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初步成熟。此外,其他中共领导人如谢觉哉、刘少奇、董必武等,在政党理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也有重要贡献。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如徐特立的《政党与政府》(1938年),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1940年)^②,陈昌浩的《政党论》(1946年),沈志远的《新政治学底基本问题》(1949年)等,在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方面亦有重要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30年中特别是在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中,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有两条线索独立地推进:一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国统区的政治学体系的教学与学术专著出版,对新民主主义政治学进行学理阐发和学术论证;二是根据地革命实践及其政治教育系统形成的知识生产,汲取并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治实践的经验,并集中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及其相关政策。这两条进路尽管是在不同的区域进行的,但两者亦有着相互配合的作用,且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亦得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相关支持。

以上简要概述了1919—1949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演进的历程,目的就在于对“新民主主义政治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概貌有所勾画。概括地说,研究新

^① 参见吴汉全:《〈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关于邓初民此著的学术贡献,可参见吴汉全:《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1940年)的学术贡献》,《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3期。

民主主义政治学史,其目的就在于描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展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相结合的过程,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的政治学成果,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艰辛历程及其所开辟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的道路,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本位”研究取向、人民至上的思想特质、实践性基础及其所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特征。基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学”形成过程,不难看出:所谓“新民主主义政治学”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和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为指导,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研究并阐发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过程中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这种现象的学问。

四、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1919—1949)的研究内容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既然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那就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王邦佐、潘世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中,就专门讲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问题,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学术上的说明,而且就毛泽东政治思想、邓小平政治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学术地位进行评价^①。那么,什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呢?简单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及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唯物史观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结合中国的政治实践并总结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斗争的经验,研究和阐发现代中国政治现象的演进及其规律的历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历史。在今天,不仅需要描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演变的历史过程,而且需要探求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的规律。

以“史”特别是“学术史”的观点来看,毫无疑问,研究1919—1949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必须重点研究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演变历程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演变规律问题。而要使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研究有所突破,根据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的基本情形,除了集中于政治学5部分内容(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研究外,还可以将研究的范围适当地扩大一些。笔者将研究范围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1. 关于政治学一般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治家在集中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政治现象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关于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关于政治民主问题的研究、关于政治类型的研究、关于近代主要政治思潮与主张的研究、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控制的研究、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研究,等等。

2. 关于阶级问题的研究。这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治家在致力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政治现象研究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关于阶级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研究、关于阶级的实质和特征的研究、关于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关于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的研究、关于中国近代的阶级格局及阶级斗争的研究、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等等。

3. 关于政党问题的研究。这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治家在集中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同时,所涉及的关于政党的实质与特征的研究、关于政党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研究、关于政党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关于政党制度与政党纲领的研究、关于政党领袖的研究、关于政党与群众

^① 参见王邦佐、潘世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第20—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关系的研究、关于政党建设的研究、关于党政关系的研究、关于政党之间关系的研究、关于近代中国党派的研究,等等。

4. 关于革命问题的研究。这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治家在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独特性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关于革命的根源、实质及其作用的研究、关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研究、关于革命形式的研究、关于革命与改良的研究、关于革命类型的研究、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研究、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研究,等等。

5. 关于国家问题的研究。这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治家在集中阐发人民民主专政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国家命运的研究、关于国家职能的研究、关于国家的类型的研究、关于国体与政体的研究、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关于国家与民族关系的研究、关于建国理论与建国方案的研究,等等。

6. 关于治国问题的研究。这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治家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关于人治与法治的研究、关于集权与分权的研究、关于领导与决策的研究、关于用人政策与干部政策的研究、关于官与民、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研究、关于政治协商与民主集中的研究、关于廉政建设的研究,等等。

7. 关于外交问题的研究。这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治家基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关系视域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实践,关于世界大势与潮流的研究、关于外交原则与策略的研究、关于国家外交与政党外交的研究、关于国际战争与和平、中外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关于中国近代外交论争的研究,等等。

8. 关于军事问题的研究。这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治家基于“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①的理念,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关于军队的产生及其性质、功能的研究、关于军队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关于军队与政党关系的研究、关于军民关系的研究、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关于近代中国军队的研究,等等。

为了更好地阐发 1919—1949 年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的历程(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历程”)及其所关注的主要方面,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学术前提:

一是要对中国现代政治史进行基础性的研究。这是由于政治学乃是对于政治现象的研究和反映,尽管这种反映有时是直接的,有时则是间接的甚至是曲折的,但都与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现象密切相关。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 1919—1949 年间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变革现代中国政治的努力,但亦受制于现代中国政治的变迁所造就的历史条件。在这种意义上说,唯有从中国现代政治变迁的研究中,才能呈现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民主主义政治学)的学术进路、学理内涵、思想特质及演进方向。因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研究中,也就需要树立“以政治史为基础深化政治学研究”的思路。这就需要研究者先行地对中国现代政治史进行基础性的研究^②,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提供关于政治现象的学术资源。

二是要对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学进行学理性的研究。这是因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乃是在与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学相斗争中而发展的,并且亦基于中国现代政治变迁的需要,批判地承继政治学研究相关的有益性成果,故而需要对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学给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80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② “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可参见王金镛、陈瑞云主编:《中国现代政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吴汉全:《中国现代政治史》(3 卷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予学理性的研究和说明^①,借以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演进的学术环境。事实上,作为整体的中国现代政治学史,固然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作为主体性内容,但同时也要包括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学变迁的内容。研究者如果对严复^②、梁启超^③、刘文岛、张慰慈^④、高一涵^⑤、杨公达、萧公权、王世杰、杭立武、陈之迈、王赣愚、陈伯骥、杨幼炯、傅瑞华、吴之椿等的政治学成就有所研究,则将有助于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的研究。研究者对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进行相关的研究,至少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提供学术语境及学术背景。

五、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1919—1949)的研究价值

梳理1919—1949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演变的历程,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及政治家对政治学的贡献,固然在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提供基本的学术积累,但同时也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的研究体系,使人们知道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这门学科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那么,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这门学科有什么作用呢?换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研究价值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至少有这样几点:

一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打下较好的基础。全面地总结20世纪的学术遗产,撰写整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著作,是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新局面的基础性工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应该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各门专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自然是其中应有的内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中,政治学史、经济学史、哲学史、史学史、社会学史等是主体部分。因而,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的研究,能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⑥。

二是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提供学术资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借鉴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思想解放,观点开新,注重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关注现实政治生活中重大政治现象,出版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政治学著作,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譬如,《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与展望》一书^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及研究成果作了学术的梳理和学理的总结,提出了中国政

① 关于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学,可参见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② 可参见吴汉全:《严复与中国政治学的起源》,《学术界》,2024年第1期。

③ 可参见吴汉全:《梁启超与中国政治学的起源》,《学术界》,2023年第1期。

④ 可参见李宗楼、吴汉全等:《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的张慰慈》,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⑤ 关于高一涵的政治学思想,可参见吴汉全所著《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及吴汉全与高大同合著《高一涵评传》(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需要说明的是,高一涵不仅有《政治学纲要》(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等政治学理论专著,而且还有《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及《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最早载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3卷第4号,1926年2月;其后,由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专门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商务印书馆于2021年将高一涵的《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两部著作,汇合在一起,以《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书名再版。笔者受商务印书馆邀请,撰写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学术名著:写在高一涵两部政治制度史著作新版之际》,作为此著的导读文章而载入该著之后,可参阅。

⑥ 笔者在撰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上中下卷)时,尝试地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参见拙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⑦ 杨海蛟:《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与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治学在 21 世纪发展的新思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相比较而言,中国政治学界还不大注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遗产的总结,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还无人问津,当代政治学者疏于从中汲取有益的学术智慧,令人遗憾。现今的中国政治学与 1919—1949 年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学术思想的传承上可以加强。学术界如能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资源加以发掘和整理,就可以为现今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本土化的学术资源并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学术启示。

三是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一条新路。目前,中国的理论界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学方面可能是最为主要、最为突出的方面^①。再进一步,我们如果能够写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史等,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的研究,如果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这个根本问题,则能够有助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途径。

四是为构建现代精神传统、助益人生修养作出贡献。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自然是为推进当今中国的学术发展、政治进步服务,这样一个追求目标不应该回避;但是,也不仅仅是如此。助益人生修养,陶冶人们的性情,丰富和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研究的重要追求。五四运动以来的精神传统,包括自由、民主、平等、进步、竞争、创新等价值观念,已经深入我们民族的心灵之中,同时也内化在我们现今的行为方式之中。毫无疑问,五四运动以来的精神传统,最主要的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所构建起来的,这是一份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等方面的研究,使五四运动以来所构建的精神传统能够发扬光大,对于我们的人生修养以及民族精神的传承,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而不应缺少的工作。

当今中国的政治学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着力,借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就需要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中汲取有益的学术资源。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梳理“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建构的历程及其学术经验,能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这门学科建立起来,并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中的基础学科,为政治学这门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化作出贡献。

作者:吴汉全,杭州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省杭州市,311121);

王中平,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省杭州市,311121)

(责任编辑:林立公)

^① 就历史的进程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固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之中的全面推进,但程度可能还有所不同,政治学方面可能更为显著、更为突出。就政治学而论,譬如,就国家论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阐发的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又譬如,就阶级论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阶级状况,作出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是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反动阶级(国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斗争的结论;再譬如,就人民论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因为是研究两大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将无产阶级作为“人民”范畴,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将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范畴。以笔者之见,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问题,需要作细致而切实的研究,才能说清楚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整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